

■第一阅读



□黄传会

皮村,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与东四环之间的一个村庄,毗邻温榆河,距离市中心40多公里。常住人口1000多人,外来人口5000多人。外来人口数量随着市里高楼拔起,仍在不断增长着……

这是DV纪录片《皮村》的开场旁白。《皮村》没有故事,基本是人物访谈,当地村民主要回顾皮村的历史,而新住民(打工者)则讲述自己的生活、工作状态。我是在网上先看了《皮村》纪录片再来到皮村,找到纪录片的编导王德志的。

“《皮村》是2007年拍的,现在这里人口又多了,起码超过万人了,不过谁也不清楚这里的具体人数。我们只觉得几年间这里的店铺越来越多,小街也变得越来越挤。”王德志说。

尽管四周已经盖满了楼盘,尽管房地产开发商一直对这片土地垂涎三尺,但因为皮村就在首都机场飞机航线的正下方,它才躲过一劫。

王德志个头不高,显得有些瘦弱。这几天冷空气下降,他得了感冒,不停地咳嗽着。王德志告诉我:“我们这些进城务工的年轻人,最早一般都住在三环一带,后来三环繁华了,房租太贵,我们就搬到四环;再后来,四环繁华了,我们又搬到五环、六环,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了,我们却不断被边缘化……”我说:“能不能打个不恰当的比喻,你们就像是打了败仗的士兵,在做一次次撤退。”

“不,应该说是为了最后的胜利,我们在做一次次阵地转移,最终,我们是一定要夺回城市这块阵地的。”王德志说得很坚决。

除了纪录片《皮村》,王德志还与工友一起自编自导自拍了两部打工题材的小电影。一部是《顺利进城》,讲述的是一个名叫顺利的农村青年,进城打工被黑旅店、假中介、手机贩子欺骗的遭遇。另一部是《命运人生》,反映两个打工青年与自身命运的抗争。一个是理想主义,一个是现实主义。片尾,两位主人公有这样的两句对话:“不是世界把我们的命运都安排好了,应该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。”“对,咱哥们儿先干起来再说,让我们改变命运。”

又一架“歼”从头顶飞过,传来巨大的轰鸣声。王德志像是自言自语:“《命运人生》其实就有我自己的影子,它同时也是许多打工者的经历。”15年前,王德志从那个叫跃进马场的小乡村,踏上了漫漫打工路……

1977年1月,王德志出生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跃进马场。那个地方原来是个军马场,王德志的父亲年轻时就放过军马。后来,不养军马了,就改为种地和放羊。马场地处丘陵地带,站在家门口,可以看见连绵不断的小山包。王德志告诉我,他家有80亩地。我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到陕北一个贫困县采访,一位当地老乡指着对面山告诉我:“那一面山都是我家的地。”当时我吓了一跳,那一面山该有多少地?该打多少粮食?后来才知道那些地都是贫瘠的薄地,老天爷高兴了,多下几场雨,能图个肚子饱;老天爷不高兴,就贷款吃国家返销粮。

王德志还有两个弟弟。小学毕业,初中刚刚读了一学期,家里的地种不过来,父亲就让他休学了。农村的孩子想改变自己的命运,只有靠读书,考大学。现在读书梦彻底破灭了,王德志在被窝里偷偷哭了两场。

为减轻家里的负担,王德志帮父母种过地,放过羊,上山凿过石头,往城里贩过菜,但家里依旧是清贫如水。有一次,在邻居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节目,王德志突然发现相声节目特别受欢迎,他想,自己要是也能写相声、说相声,那就可能出人头地、当明星,帮家里挣钱。于是,他居然异想天开地创作起相声来。

他永远记得这个日子——1995年11月18日,他从家里卖粮食挣的1500元里悄悄拿了700元,给父母写了一封信,说自己准备到北京闯世界,交给一位要好的伙伴,让第二天送给他的父母。而他自己当天便悄悄离开家,乘公共汽车赶到旗里,然后再乘火车来北京。

火车到达北京是第二天清晨,王德志一路打听到了中央电视台传达室。传达室接待人员问他要找哪个部门哪个人,王德志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哪个人,只说自己写了个相声,准备上春晚节目。人家一听笑了,告诉他:“小伙子,实话跟你说吧,今年春晚的节目早就敲定了。”

■尚书房



《兵谣》《乡谣》《街谣》(“日子三部曲”)修订版终于要重新出版了。本是白话小说,语言也平实朴素,内容不过军人、农民、市商的平常日子,亦无引经据典,更无诗词曲赋,无须赘言解析。但三部曲的第一部《兵谣》,1996年11月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,至今已近15年之久。

其实三部曲重新修订,动因不在今天再版,主要是3年前台湾兄弟李锡东先生要陆续出版繁体版,竖排版式页面字数少,《乡谣》和《街谣》厚如陈砖。且作品面世后,自己感到一些不尽如意之处,借此机会,于2007年修订了《乡谣》,台湾版更名为《日子》;2010年修订了《街谣》,台湾版更名为《书商》;自己一直对《兵谣》的文字不太满意,台湾出版时因篇幅

# “凭啥工人要贴‘农民’标签”

这里,王德志认识了孙恒,当时双方都有一种惺惺惜惺惺,英雄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回想当时的情景,王德志说:“当时他唱歌,我说相声,他给我的印象是这小子歌唱的真好,而我给他的印象是相声说的真不赖。”

来自河南开封的孙恒,1995年从一所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后,当上了中学的音乐教师。由于无法忍受那千篇一律的生活,1998年暑假,他辞去了工作,披着一头长发,怀抱一把吉他,来到了北京。

走出西客站,夜幕刚刚降临,迎着刺眼的霓虹灯和川流不息的汽车,他不知该走向何处,何处是他的落脚之地?原来心中的那份兴奋和豪迈之情倏然消失了,他意识到必须立即找到一份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工作。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搬家公司当搬运工,干的是几乎无法忍受的强体力活,一天里腰差不多都弯成一张弓。后来,他还当过推销员、送报员,在酒吧和地下通道卖过唱。最窘迫的日子,他靠10元钱支撑了一个星期。出生于贫寒家庭的孙恒不怕吃苦,但他感到迷惘和孤独,这里没有熟人,这里无人可以倾诉,这个城市不属于自己。

孙恒离开了北京,开始一边卖唱、一边打短工的漂泊生活。大半年里,他走了好几个省,接触到了大量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工。从建筑工人到小商贩,从推销员到保安、保姆。他们的酸甜苦辣的生活,同时也丰富了孙恒的人生阅历。他们的永远说不完的故事,变成了孙恒的一首首民谣。一次,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望一位老乡。寒冬腊月,大学生社团募捐了一批衣服,准备送给建筑工地的农民工。孙恒带着吉他也跟着去了。在毛竹搭成的极其简陋的工棚里,挤满了刚刚下班的满身灰尘的工人,孙恒为他们唱自己写的歌,他唱了一首又一首,工人人们的掌声一次比一次热烈。像是与兄弟姐妹在聊天,像是心灵间的对话,孙恒觉得心里热乎乎的,因为自己找到了知音。他发现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工也同样需要精神文化生活,他可以用自己的歌声,直接去为劳动者服务。

为劳动者而歌,为打工者而呼!王德志完全赞同孙恒的理念。

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,孙恒、王德志和几位志同道合、爱好文艺的年轻人,成立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(后来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前身)。同年11月,他们在工商局注册了旨在为打工者服务的非赢利性社会服务机构——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(简称北京工友之家)。主要致力于打工群体的社会、文化、教育、权益维护及其生活状况的促进和改善。

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的第一场演出,是在北四环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,四五百名刚刚下班的工人闻讯赶来,把土台子围得密密匝匝。

尽管打出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的旗号,但当时设备简陋,全部“家当”只有两把吉他,一把口琴,一只家庭唱卡拉OK用的绑在一般钢筋上的麦克风,两只又小又破的音箱。电线上挂了几个照明用的小灯泡,台前挂着一“天下打工是一家”的横幅。

唱完了《打工打工最光荣》,孙恒接着唱《团结一心讨工钱》。当时建筑业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十分严重。孙恒唱到了工人们心里的痛处,他们也跟着他一起唱唱起了最后两句:“团结一心跟他干!条件一个讨工钱!”整个演出现场群情鼎沸,热闹异常。正在这时,一个工头带着几个人走上舞台把他们赶了出来。不过,几个年轻人依然感到很刺激、很兴奋、很有成就感。

刚开始,他们借住在海淀区肖家河一所打工子弟学校——明圆学校。平时排练节目,周末去工地、社区、学校演出。

2004年秋,明圆学校扩大招生,教室不够用,他们又转移到东坝,也是借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舍。这时候,他们得到了一家慈善机构的资助,几位骨干每月有了1000来元的生活费。

2005年春节后,他们又开始找地方,7月,来到了皮村。

王德志只有小学文化程度,但由于学习刻苦,加上这些年来生活的磨砺,他比一般的打工青年要成熟得多。与他交谈中,他的嘴里会不时地冒出社会学者和媒体记者惯用的词语。“15年前,我是为了出人头地,带着一个明星梦来到北京的。艰辛与挫折告诉我,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,既缺乏当明星的先天气条件,又没有当明星的后天环境,是绝对成不了明星的。成不了明星,我却在为打工者服务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”王德志像是为自己15年走过的打工路在做小结。

我请王德志谈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,他谈了他们这代人的优点、缺点和追求。他说:“我们这代人目标很明确,离开农村,就是向往城市生活,就是想通过迁徙流动,永远成为城市公民。”

我问:“听说你不赞同‘农民工’的提法,为什么?”王德志说:“‘农民工’这个称呼是双重身份,既是农民,又是工人。我们既没有土地,也不会种地,而且,我们已经离开了农村,怎么还是农民?”

“那你们应该称为什么合适?”“你们应该被称为工人,或是新工人。凭啥工人要贴‘农民’标签?”王德志说,“既然我们是工人,我们就应该享有城市工人的权益,住房、医疗、就学……这一切都应该享有!”

我问:“你们这代人肯定要留在城市?”

王德志点了点头,语气坚定地说:“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农民,在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过程中都转为工人,成为新市民。我们这代人肯定要留在城市里,一定会留在城市里!”

(节选自《中国新生代农民工》,黄传会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年7月出版)



王德志像是被谁用冷水从头到脚浇了一遍,浑身直打战。家乡是回不去了,首先得要解决住的问题,在西客站附近羊坊店转了一圈,一般的旅店是住不起的,他咬咬牙住进了15元一天的一家地下室,买了15袋方便面,把自己关在里面整整“憋”了3天。

3天后开始找工作,既没有老乡,也没有熟人,不过电杆上到处贴着招工小广告。他没有文化,又没有手艺,只能找那些最简单的活。

会城门有家饺子店要招一名杂工,他找上门,老板见小伙子一副朴实样儿,便招用了。说好管吃住每月工资350元。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,一刻不停地洗碗洗菜。他不觉觉得苦,觉得比在老家干农活要轻松多了。拿到第一个月工资,他很激动,自己留下50元,其余的全部寄给了父母。以后,他每个月都给家里寄300元。

半年后,他觉得趁现在年轻,应该学一门手艺。便辞了饺子店的活,找到新中街一家不大的酒店学配菜。这家酒店上午不开门,中午开门一直到营业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。慢慢地,他发现一个规律,每到凌晨一两点,便会有许多漂亮的小姐来店里吃宵夜。开始,他觉得有些纳闷,这些漂亮的小姐为什么会集中在一两点来这里吃宵夜?后来,才弄明白,离这里不远就是港澳中心和亚洲大酒店,这些漂亮的小姐都是歌厅里的“歌姐”、“歌妹”,一两点正是她们下班的时间,唱歌累了,肚子饿了,经过这里顺便来吃宵夜。

后来,他还当过厨师,当过面包师,当过推销员,当过送水工。

打工生活是艰辛的,不过,再艰难再辛苦他都挺过来了。有一天,王德志在翻看《北京晚报》时,无意间发现有一所艺术学校正在招收相声学员,隐藏在心中那个明星梦又被牵引了出来。

学校每星期上一次课,而且是在晚上,不影响干活。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第一次与老师见面,老师听他一口内蒙“普通话”,便对他说:“德志啊,你说相声,必须先改改你的口音,把普通话说说好。否则,观众怎能听得懂你的内蒙口音‘相声’?”

当时,王德志在公主坟附近的一家水站上班。工友们发现,有一空闲,王德志就苦练普通话和基本功。吊嗓子,背菜名,时不时还说点绕口令……

断断续续学了3年,当年报名的二十几名学员,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王德志一人。说相声一般要一对外,老师帮他找了个也在北京打工、同样喜欢相声的青年李永做他的搭档,两人一直合作至今。

有一天,也是在报纸上,王德志获悉某电视台正在举办相声小品邀请赛,他和李勇带着他们的原创作品《飘》,赶紧跑去报名。凭借实力,他们闯进了第二轮,但最终没能入围决赛,只获得了一个安慰奖。通过这次参赛,王德志发现相声界是个讲师承、论资排辈的圈子,自己并非师出名门,想在这里找到立足之地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2002年过了春节,王德志听说雍和宫附近有个“打工妹之家”组织,是专门为进城的农民工服务的。他跑去了解一下,果然有这么个组织。一些社会学者和大学生志愿者,利用周末时间,为附近的农民工举办各种讲座,有时还有小型演出。就在

# 谁解其中味

□黄国荣

合适,当时抽不出时间修订,故文字未作改动,只更名为《突围》;这次再版,咬了咬牙,重新作了修订。再则,至今时常有人在我的博客和邮箱里留言,对这3部作品表示喜爱关注,还有不少读者说购买不到书,读者越是喜爱,我越得对读者负责。

这次修订改动最大的是《街谣》,不只文字润色,结构上也作了较大调整,篇幅压缩了近6万字。其次是《兵谣》,结构和风格虽保持了原貌,但全书文字在不改变原汁原味的前提下重新逐段逐句过了一遍。《乡谣》只改动

了开头章节,全书保持了原貌和原有的风味。

虽是修订,但敝人为文向来一根筋,不达本意不罢休,尤其是《街谣》,原作差不多只当做初稿,费了再度创作的心血。也有朋友劝我,这3部作品出版后,读者和文坛已有定论,广播联播了,电视也拍了,奖也得了,何必这么劳神费力。这让我想起曹雪芹先生的那首小诗: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,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?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,正合此意。李锡东老弟在一次朋友聚会的餐桌上说,真正的作家跟常人做事真不一样,有时候确实有点痴迷,去年大哥在台湾时,别人都去台中、台东、台南游览了,他却把自己关在王朝饭店的房间里修订《街谣》。

作品是作家的孩子,总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。

(《兵谣》《乡谣》《街谣》,黄国荣著,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11年10月出版)

■书斋札记

写诗以来,除了感谢诗歌给予我丰富的心灵之外,还要感谢诗歌使我结识众多的真挚诗人,杨锦则是我一生荣辱与共的兄弟。他与我同龄,我们相识于20岁那年的北国深秋,他和黑龙江几所大学的校园诗人前来拜访徐敬亚、吕贵品、王小妮等人。当晚他借居在他的中学同学那里,而他同学恰是我的大学同学,经介绍,我们握手寒暄,之后展开关于诗歌的频繁通信。

大学毕业后杨锦也来到北京,创办《人民公安报》并担任副刊编辑。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两个异乡青年周末经常聚在一起,他,或者我,经常出现在对方宿舍的门口,然后拿着铝饭盒,去食堂奢侈地添加时令小炒。诗歌曾是我们那段时光最重要的话题,我们之间的友情却早已超越诗歌本身。

在黑龙江大学读书期间,他和杨川庆共同创办冰帆诗社,一度成为校园诗歌写作的北国亮点。在青春期写作亢奋的状态下,这位中文系学子瞬间成为一个诗人,写出大量带有校园诗歌特点的作品。之后,他的诗歌情绪并没有终结于大学围墙,而是绵延于他整个内心,并在理想主义风靡的年代里不断写出亮色的诗作。上世纪90年代之后,他很少把诗落笔于纸上,但还是尽其所能,在报纸上坚持开设“三月诗会”专版,始终一贯地热爱着诗歌。

是的,在诗歌观念和认识上,杨锦和我存在某些差异,但对诗歌的热爱却是不容置疑的一致。后来杨锦避开现代主义诗歌给他带来的迷惑,专心致志地创作散文诗,他的《冬日,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》一诗被众多人熟知传诵:“冬天,不管有没有雪,有没有风暴,有没有远航的船,你一定要到海边走走,去看看寂寞的海,像看望久别的朋友或远方不知姓名的恋人,给海一点微小的安慰,不要让冬日的海在孤独中感到忧伤。”一首诗若被世人铭记且传诵,是一个诗人最为荣耀的事情,杨锦的《冬日,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》正是如此。他骨子里的忧伤和细腻,情感中的博爱和怜悯,在他后来的散文诗中比比皆是。

事实上,杨锦就是在冬天里去看海的人。在人们远离离诗的现实生活中,凭借着炽烈的艺术情感,坚守并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凝练而深邃的诗歌艺术。来自西部乌兰察布草原的他总带着草原人独特的豪爽、豁达和善良,这种性格是属于自然的,因此,旷野和海洋、落叶、鱼和鸟、森林、花朵都在他的诗歌中表现着作者的思想。他的诗歌都是从自我出发,以一颗明澈而丰富的心灵,体会大千世界复杂的事物。一旦把现实的万事万物放在自我情感的支点上,他的每一首诗都透着缠绵和温柔的气氛。

杨锦是一位性情中人,聚会时有时会突然站起身来,把椅子拉向一边,表情肃穆,在大家疑惑的时候,蒙古长调从他那浑厚的嗓子里苍凉而忧伤地飘出来。这位草原之子,用他的歌声与蓝天白云天然相连,闭目倾听,能感受到成群的牛羊走出天边。他是一个天然的情感诗人,一部悲剧电影、一次浪漫的长途旅行、一朵云、甚至打错一次电话,都能激发起他的创作灵感。他的诗歌从不刻意雕琢,完全是由情感里涓涓流出,因此,质朴的诗歌语言已成为他艺术创作的最大特点。在《有一朵云正在远去》中,他期待着一个人的脚步,并在心里“用纯净的目光护卫一座圣洁的殿堂”,“凝视双目,静静等你”,“只有风掠过冰凉的面孔”,“从此,这张被我囚禁已久的日子便疯狂地生长着荒芜之草,并且深埋我的心灵一角/年年月月,岁岁息息”。或许是因为老友的诗,我读得相当认真,并被牠与生俱来的忧伤所感染着。

杨锦习惯于在诗歌边缘冷静观察诗歌的繁华与衰落。在当年以各种流派为时尚的青年诗人群体中,他是独立的,从不随波逐流。他更多地将诗歌摆放在个体生命的内部,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考。这种甘于寂寞的孤独感,使他在思想和艺术上不断超越自我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,只是他早已由青春的抒情式主题转变为以时代为背景的生命体验,笔法趋于理性和冷峻。在诗歌热闹的中心,他是缺席者,但在需要诗歌的时候,他永远不会缺席。在诗意丧失的时代里,我们很难地创造诗意,就像歌德曾经说过的,不断向山顶推着石头,而石头却不停地滚落下来。当我们也滚落下去,石头或许已在低处找到安身的位置,它本身并不想置于高处,是我们主观上总想把它当做高端的标志。

某些白羽是纯粹诗人的人,正把诗歌当成垄断或私属的玩物,在浮躁的功利中博弈着虚幻的名声,他们故意忽略或视而不见为诗歌默默做出努力的其他人。汶川大地震刚刚发生,时任群众出版社社长杨锦被网络中的诗歌所感动,第一时间决定出版《汶川诗抄》,只用3天诗集印刷完毕并全国发行,所得款项和一部分诗集都捐赠给灾区。地震后,一些貌似追逐纯粹艺术的某些诗人展开反思,对诗人具备社会责任感的行为予以非难,似乎只有在维护中国诗歌的尊严。他们则剥夺别人的权利,肆意表现着自己的深刻和与众不同,进而冷血地阉割诗歌和情感的关系。他们的所谓反思令我感到疑惑,难道在大灾难面前,一个诗人高尚的奉献都要被人责难?某些诗人需要自我清醒,别把自己装扮成精神洁癖的所谓大师,别以为中国诗人只是几个人。

上世纪90年代,杨锦曾被委任为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。那时正值我刚留学归国,对于习惯于闲云野鹤生活的我而言,对于组织上安排的角色,有一种本能的抵触。对他兼任会长之职,我经常冷嘲热讽,觉得冠得虚名不如自己沉寂下来写作。对此,他总是呵呵一笑。

其实,这些年来,杨锦对我的宽容源自于草原的胸怀,我可以忘乎所以地在他面前对任何事物进行抨击和愤怒,他总是微笑倾听。偶尔我也在反思,为什么在杨锦等老友面前总分置张呢?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把他们当成另外一个自己。上苍如此安排,我也无法改变,在接下的余生中希望能与他们角色对换,我也想只听不说。杨锦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单纯的文人,但事实是他在本职岗位上也有建树,这让我有些惊诧,转念一想,以他的品德和能力,一切都在情理之中。

艺术手法最高成就、文学的光辉就在于质朴,诗歌应当成为人的最高追求和境界,它不验证人生价值,但它显现人生价值。杨锦从不以“诗人”的头衔自居,他活得真实可信,有血有肉。正是这种人格力量,他的诗歌爱恨分明,但诗人的内心从未远离过诗歌本身。作为他的兄弟,也作为一个读者,在他出版散文诗集之际,真心希望他永葆自然精神,将诗歌触角向更广阔的现实伸展。

最后我还想再叮嘱兄弟:无论称谓如何变化,诗人永远都是自己最本真的身份。

(《冬日,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》,杨锦著,作家出版社,2011年11月出版)

# 冬日,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

□苏历铭

